

金华籍先进知识分子对建党的理论贡献

陆昇

中共金华市委党校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转换的第一步，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力量的崛起，最后汇聚成“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陈望道、邵飘萍、施存统为代表的金华籍先进知识分子，站在时代浪潮的最前沿，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创了多个第一：国内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人、以专著形式系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人、团中央第一任书记。他们在启发理论自觉、开展理论宣传、进行理论探索等方面为党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理论自觉：发轫五四运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00.）五四运动有两层涵义，一是特指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二是泛指“五四”前后数年的新文化运动。（华德韩.邵飘萍与五四运动[J].中共党史研究，2001〈1〉:77.）金华籍先进知识分子勇敢投入这一浪潮，唤醒民众觉悟，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唤醒民众意识，发轫五四运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没有成立共产党，但已经有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99）邵飘萍即是其中一位。1918年，他协助蔡元培创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并担任导师。在讲课中，他不仅传播新闻知识和理论，而且强调访员的操守和思想训练，另外还涉及政治经济、劳工等内容，传播爱国与反帝反封建思想。研究会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促进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中共早期党员毛泽东、罗章龙等都是新闻研究会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曾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27.）

五四运动前夜，十几所学校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法科礼堂，邵飘萍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学生们要挺身而出，救亡图存，奋起抗争。5月4日上午，邵飘萍又前往指导北京大学学生举行的筹备会，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最后的酝酿和准备。

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当时，无政府主义等新思潮大量涌现，但都如昙花一现。“以俄为师”逐渐成为中华大地的时代强音，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邵飘萍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两个月中，发表署名文章40余篇，推动五四运动从思想舆论上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

（二）引领“一师风潮”，推进新文化运动在浙江深入

“五四”时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逐渐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一方面，一师学生施存统等向市民进行爱国宣传声援五四运动，成立“全国书报贩卖部”和“书报贩卖团”宣传新思想；另一方面，在经亨颐校长的带领下，陈望道等教师通过提倡白话文、教授汉语拼音、出版国文丛书等形式，积极提倡新学，推行教育改革。

1919年10月，在经亨颐校长和陈望道的支持下，一师创办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浙江新潮》。《浙江新潮》第二期刊登了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该文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动当局要求经亨颐辞退进步教师陈望道等4人，开除学生施存统，但被经亨颐拒绝，浙江省教育厅遂撤去其校长职务，另派校长，一师学生拒绝新校长到任遭到军警殴打，引起公愤，引发全国舆论和各地学生的声援。“一师风潮”历时两个月，是五四运动在浙江的继续，是浙江新旧文化交锋的重要回合。经历了“一师风潮”的陈望道认为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判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陈望道.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J].文艺月报,1959(5).）

二、理论宣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投身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来，金华籍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其中第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翻译经典，为建党奠定理论基石

《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五四时期，像李大钊、梁启超等都有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有关章节，但没有中文全译版，这一定程度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宣言》内容深刻，文字优美，翻译难度极大，恩格斯也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6.）翻译者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精通德语、英语和日语中的至少一种，还要有较强的中文水平。1920年2月，经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推荐，陈望道应《星期评论》社之邀翻译《共产党宣言》。他根据日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费了平时译书五倍的功夫，在家乡译出了中国第一部中文全译本。首译本充分利用当时思想界流行的语汇，准确传递了思想，同时语言表达接近口语，适合大众传播。首印1000册，很快销售一空，至1926年已出版17版，成为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一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一大批先进分子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1936年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首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均吸收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

建党前后，陈望道还翻译《空想的科学和社会主义》一书，并翻译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解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施存统在留学日本期间，先后翻译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植田好太郎、河上肇等人的文章9篇。从日本回国后，施存统继续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相关论著22篇，并编译了《社会经济从刊》一书。

（二）编辑刊物，创建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

陈望道在一师参与主编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的《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和《浙江新潮》。翻译完《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被委任《星期评论》编辑，后任《新青年》编辑、主编。他任主编期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苏俄革命经验。1920年11月，陈望道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此后，陈望道担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将《觉悟》改版为党的外围刊物，并在1920-1924年间发表了近200篇文章，成为继《新青年》后又一马克思主义宣传舆论阵地。

邵飘萍利用新闻平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京报》1920年复刊后，报道、译载了介绍苏俄的大量情况，突出刊载中国共产党人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信息，使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

施存统先后为《浙江新潮》《星期评论》《共产党》月刊撰稿，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负责编辑出版多期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他在《先驱》上就团的性质、作用、组织形式撰写了系列文章，对青年团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著书撰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邵飘萍因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认真研究各国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撰写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新俄国之研究》是中国最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专著。他在书中指出：“俄国今日所实行之社会主义，非独在俄国之政治与社会中为空前之创举，实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49.）该书1920年8月一经出版，就受到热烈追捧，到1927年已经连出三版。1920年4月出版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则评论了当时西方各种政治学，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三方面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直言“共产主义公然标识于世界者自此始”，昭示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趋势。

施存统留学日本后，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写下《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等文章寄回国内，在《共产党》月刊等刊物发表。

三、理论探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7-02.）金华籍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初步探索，使其与中国革命产生了关系，尽管不够系统，但富有革命精神和开拓意义。

（一）参加党的早期组织，阐释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及其使命

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成立时的9名成员中，浙江6名，金华占2人，分别是陈望道和施存统。关于成立原因，陈望道回忆：“认识到空谈的无用，遂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 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M].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0.）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中国社会改造问题，陈望道指出：“要使普通劳动者过着‘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会主义。”（陈望道. 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N]. 民国日报〈觉悟〉，1920-11-07.）施存统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完成社会革命的手段”。（施存统. 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J]. 共产党〈月刊〉，1921〈5〉.）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其成立的8位发起人中，浙江4人，占一半，金华2人，依然是陈望道和施存统。

1920年3月，由李大钊倡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邵飘萍主动参与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发挥自身优势，在报纸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宣传活动，帮助翻译和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通过办报便利对研究会的出版物和相关文献印刷等给予无条件帮助。

1922年3月，施存统经陈独秀指派接受了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任务，1922年5月被选为团中央书记，青年团恢复不到6个月，就成立地方团组织17处，全国团员数量达到5000余人。他在《本团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建筑在青年无产阶级上面”。

（二）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阐释阶级斗争和劳动专政思想

五四运动之后，金华籍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亲身从事工人运动，把马克思理论用于工人革命实践，

到工人中去指导开展革命活动。

陈望道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担任了三个月的劳工部部长。在他指导帮助下，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以及纺织、邮电工会等中国第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组织成立了。他经常与其他早期党员一起，深入工人聚居区向工人群众发表关于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的演说，正如其在《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所言：“初期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们的经济斗争。”与此同时，他协助创办我党最早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先后撰写了《平安》等 5 篇文章，认为要先解决劳工生活工作条件，再解决工人阶级地位和权利的劳动问题。“中国劳动问题第一步的解决，就是振兴正当的‘劳动联合’”，第二步是劳动运动。此外，他还翻译了《劳动运动通论》《劳工问题的由来》等许多文章，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施存统在参加“工读互助团”失败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进行了理论思考，在其《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他认识到无产阶级是革命主力军：这些无产阶级分子当中，最有力量做社会革命的，就是工场劳动者，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占重要位置；他强调联合和组织的重要性：“学生本身，本是没有什么力量的，然而一加入团体之中，就很有力量了”；认为无产阶级要参与政治才能取得胜利：使无产阶级个个加入政治团体，个个与政治发生关系。施存统也在《我们的大敌，究竟是谁？》一文中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俄罗斯同志做得，难道我们做不到吗？……在这无人道的社会，有时非杀人不可。”（施存统. 我们的大敌，究竟是谁？[N]. 民国日报（觉悟），1920-09-28.）与此同时，他带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了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支持“二七大罢工”、支持上海日华纱厂的罢工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共产国际高度称赞。（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J]. 先驱，1923（05）.）

邵飘萍的《京报》成为工人运动的喉舌。他通过深入报道工人阶级的困苦生活、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在一起；并及时报道香港海员大罢工，长篇报道开滦煤矿瓦斯爆炸，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详实报道了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将工人运动推向新高度。

结语

在建党百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光辉历程，金华籍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宣传真理、传播主义的先驱战士，邵飘萍同志甚至因“宣传赤化”被杀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值得永远铭记。